



重推

# 学术的传承与人格的养成

□ 刘进宝

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的“雅学堂丛书”第一辑共10种。这套丛书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丛书入选“2023年甘版年度好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入选2023年9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并被评为“2023年15种学术·新知好书”。很多权威媒体都发表了书评或报道,认为“丛书坚持‘大家小书’的基本思路,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学术交流史及其最新成果,以学术随笔形式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了解学界大家的所思、所想、所悟。”

鉴于“雅学堂丛书”出版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经过仔细考虑和筛选,我们又编辑出版了第二辑共10种,即樊锦诗《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史金波《杖朝拾德集》、刘梦溪《东塾近思录》、郑欣森《故宫缘》、陈锋《珞珈山下》、范金民《史林余纪》、霍巍《考古拾贝》、常建华《史学鸿泥》、赵声良《瀚海杂谈》、李锦绣《半梓小草》。

在考虑第二辑作者的人选时,我想既要与第一辑有衔接,又要有不同。在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时,还要看到学术的传承,乃至人格的养成。

老一代学者,由于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家学熏陶或私塾教育,都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格局比较大,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承传了一个良好传统。学子与他们相处,可以受到学习、做人、敬业各方面的影响。

为了反映学术的传承,我特别邀请了樊锦诗、史金波、刘梦溪、郑欣森这四位80岁左右的学人。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刘梦溪先生以学术史和思想史为重点的文史之学、郑欣森先生的故宫学研究,均代表了各自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

二

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守护杂记》收录了作者有关敦煌文化的价值、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与开放和向前贤学习的文章26篇。作者写道:“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者,故此我把这本书称为《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希望本书能为后续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刘梦溪先生的《东塾近思录》,按类型和题意,收入了4组文章:一、经学和中国文化通论;二、魏晋、唐宋、清及五四各时期的一些专题;三、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的个案探讨;四、序跋之属。刘梦溪说:“‘雅学堂丛书’已出各家,著者都是时贤名宿,今厕身其间,虽不敢称雅,亦有荣焉。”

郑欣森先生是“故宫学”的倡导者,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于2003年首倡“故宫学”。到2023年编辑本书时,恰好是整整20年。郑先生提出:“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保护、整理、研究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开拓性学科。”

热爱考古的霍巍先生说:“这本小书我取名为《考古拾贝》,这一方面源自我



在早年曾读到过一本很深沉、很有美感的著作,叫作《艺海拾贝》,这或许给了我一个隐喻和暗示。另一方面,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间跨度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就如同我在考古这瀚海边上拾起的一串串贝壳一样,折射出几缕大海的色彩与光芒,让人对考古的世界浮想联翩。”

赵声良先生说:“我在敦煌工作了40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与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学完全联系在一起了,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聊天,可以说‘三句话不离敦煌’。”他刚到敦煌时就想写一本有关敦煌山水画的著作,没想到30多年后的2022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山水画史》。他感叹道:“这本著作的写作过程,‘似乎也见证了: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发展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终于回归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历程。我在敦煌40年的历程又何尝不是这样。”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作者,已经或将退休,但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仍然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了这一代学人

的使命与担当。这些作者,经历了现代学术发展或转型的重要节点和机遇,既是学术勃兴、发展、转型和困顿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学术一线的创造者、建设者。可以说,他们既在经历历史,又在见证历史、创造历史,还在研究历史,将经历者、创造者和研究者集于一身。这种学术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三

从“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内容可知,伴随着“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到来,老教授的社会地位提高,有了精气神。如武汉大学1977级的陈锋预选的毕业论文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历史系清史方面最著名的教授是彭雨新,陈锋想让彭先生指导论文,“不巧的是,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同学选定彭先生作指导老师,据说,限于名额,彭先生已不可能再指导他人”。

陈锋经过准备后,就直接到彭先生府上请教。“彭先生虽然很和蔼地接待我,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让我进他的书

房,而是直接在不大的客厅里落座。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摞卡片,说这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那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我自己一直讲,彭先生并不插话。待我讲完后,彭先生问‘这个题目和这篇论文是谁指导的?’我说没有人指导,是自己摸索的。彭先生说‘没有人指导,那我来指导你的毕业论文怎么样?’我说‘就是想让先生指导,听说您已经指导了两位同学,不敢直接提出。’彭先生说‘没有关系,就由我来指导。’再没有其他的话”。陈锋写道:“老师与学生之间这种基于学术的关系,对学生向学的厚爱,让我铭感终身。”

“雅学堂丛书”的宗旨是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兼具。范金民老师写到魏良弢先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当时的学术生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明清史方向有位硕士生论文答辩,我请他主持。临答辩时,他突然把我叫到过道对门的元史研究室,手指论文,大发雷霆道‘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你们明清史是有点名气的,可照这样下去,是要完蛋的!’我一看,原来是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几处空缺。当时论文都是交外面的誊印社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有些冷僻字无法打印,只能手书填补。答辩时,我结合论文批评了那位学生做事不求尽善尽美而是草率粗放,并且论文新意殊少,价值不大,学生感觉委屈,躲在那里不愿出场回答问题。”

这样知识性、可读性兼具的文字在这些作者的论著中比比皆是,自然深受大家的喜爱。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选,各书所收文章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希望第二辑的出版不辜负读者的期待。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第三辑、第四辑,乃至更多辑。《“雅学堂丛书”第二辑,刘进宝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代序”,有删节》



霞光里的敦煌莫高窟 吴健

## 长城，是一首长长的诗

□ 胡杨

一直有一个野心,那就是用诗歌的方式,书写自己的长城志。

从敦煌到嘉峪关,从埋下胎衣的地方,到工作生活的故土,抬头仰望或者低头沉思,总是离不开长城的笼罩。长城巨大的身影,在我生命的轨迹中逶迤前行,踏破了所有的坎坷,冲破了所有的阻挠,让我成为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意志坚定的人,勇敢冲锋的人,感谢长城,它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对一般人来说,长城是历史遗迹。对我来说,长城却是我确认自己的唯一标识。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就疯狂地迷恋上了诗歌创作,在风起云涌、气势如虹的边塞诗中,我读到了古代的诗人毅然出塞、马革裹尸、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也毫不犹豫地依照古人的方式,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连七八天,在烈日炎炎的酷夏,穿越戈壁,跋涉沙漠,从阳关到玉门关,从寿昌城到河仓城,沿着一座座烽燧遗址,一步步踏踏先贤的足迹,一次次拜谒那些曾经出产千古名句的遗址,俨然是一个诗歌坚定的追随者。那些日子,身体异常疲惫,但灵魂却格外丰盈。遇到一眼泉水,一条小溪,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牛饮一番,然后痛痛快快地洗去身上的尘土。殊不知,这正是戈壁行走的大忌,落满灰尘,对皮肤是一种保护,洗去灰尘,在烈日的暴晒下,表皮皴裂、发炎、化脓,仅仅几天,我就从一个白娃娃,变成了一段“黑木炭”。那一次,长城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固执地认为,长城,其实就是一首长长的诗。

后来,我来到了嘉峪关市,一开始对这座空旷而陌生的城市有点排斥,它不像酒泉和敦煌,烟火气十足,相比而言,它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雅致的书生,有点傲气,有点冷漠。既然无法融入城市,就从城市的外围开始,深入这座城市。还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嘉峪关周边骑行,周末或者下班之后的黄昏,嘉峪关的荒野上,总会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孤零零的男人,丁零吧唧地漫游在历史遗迹间,乐此不疲,一年下来,竟然骑坏了一辆自行车。感谢长城,让我有了重新认识一座城市的机遇。从那时候开始,我便下决心扎根嘉峪关了。我知道,我的根,就在长城地带。

嘉峪关是个工矿业城市,地域面积小,各种发展资源相对匮乏,但就文化来说,却独具特色,石器时代的岩画文化,中世纪的墓葬文化即丝路文化,汉明以来的长城文化,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尤其是嘉峪关关城,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当我一次

次走过嘉峪关辖区内26段43617.44米的长城墙体,8座城堡、1座关隘、30座独立墩台……就猛然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富有的财阀。从西南面的祁连山北麓的大红泉墩,到南面的飞来泉城堡,再到西面的驷马城,再转向北面的花城湖,最后延伸至金塔黑河流域的长城防御体系……它们,构成了我的长城王国,使我乐此不疲!尤其是嘉峪关关城,中外巨防、长城主宰,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得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同事们巡查长城,探讨长城保护的最好方案,开展长城文化挖掘工作,不到几年工夫,成立不久的嘉峪关长城研究院,已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专业人才,出版了可以等身的长城研究著作,深感欣慰。

长城是一道墙,是高大的墩堡,是巍峨的关城,但更是一条情感线、文化线、交融线,让中华儿女增进了解,强化交流,促进融合,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表达对长城的敬意,但诗歌对我来说,更直接、更用情、更放旷!“长城志”多达1700多页、厚厚的三卷本,应该是我挚爱长城的心跳,应该是我自己的长城志!

但一切都没有停歇,这仅仅是开始!《“长城志”三卷本,胡杨著,燕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评

## 以全球视野书写科学史

□ 汤绮云

我们生活在科技昌明的时代,信息技术让上网更加便捷的同时,重新思考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是全人类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元科学,它是研究科学过程的科学,包括科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等,也被称为“科学中的科学”。但是现有的科学史书籍受限于著书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视角;而中国人的科学史写作,起步较晚,也多着眼于中国,少有全球视野的科学史写作。

有鉴于此,暨南大学教授成生辉和西湖大学教授崔维成尝试将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并采用系统思维模式和元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梳理人类的科学发展过程,从而著成这本《科学的起源》。该书从科学和元科学的叙述开始,从四大文明古国所代表的东西方科学的起源和萌芽,写到现代科学兴起之后,西方近代科学结出的累累硕果,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伽利略和牛顿建立起的经典力学,达尔文推出的进化论……科学学科形成,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东方,科学的发展更多源自实用主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近代科学的渐变与突破积累了能量。

《科学的起源》一书认为,科学的发展始于科学观的改变,哲学家在推动科学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新技术带来新理论,新理论催生新技术,科学和技术的界限渐渐模糊。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东方世界的科学发展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落后,再次崛起,帮助人类向世界的先进文明更近了一步。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最初是一颗小芽,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树上的分叉就是分化出来的学科。古代科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后来逐步分化出数学、天文学、力学等,近代以后的分化更加迅速,相继建立了经典力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基础科学,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互相着力。

《科学的起源》梳理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不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现了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与过去大多数科学史著作只关注西方科学史不同,两位作者将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并采用系统思维模式和元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梳理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弥补了东方科学被忽视的缺陷。

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认为:“科学家思考反省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源头与发展历程,科学的前沿与应用等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科学的起源》论述了科学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之中得以诞生和发展,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2022年,科学史被纳入本科专业新增名单,可见国家层面对科学史的重视。

《科学的起源》,成生辉、崔维成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动态

滴水藏海

### 《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出版

近日,甘肃省民协理事、金昌市政协主席肖永晖的著作《对话乡愁——金昌民俗文化研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金昌市举行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该书是对近30年来金昌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精髓汇集。全书集录了32万多字,200多幅照片,由“寻根理脉、民淳俗美、说唱曲艺、妙手巧工、味蕾记忆、镌刻年俗、民俗建筑、流年印象”等篇章组成。

首发式上,民俗文化爱好者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该著作价值特色,在金昌民俗文化、非遗传承弘扬领域的作用等展开交流研讨。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牛乐认为:该书以地方性视角,将金昌民俗文化中的人生礼俗、生产生活民俗、文化记忆,包括民艺行业发展等诸多小叙事以文学的形式,讲述“金昌故事”,生动展示了金昌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地方魅力。(王郢)

### 又见槐米压枝香

□ 罗新海

盛夏清晨,漫步小城老街,路两边半矮粗的国槐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人们撑起一道道绿荫。微风吹来,飘过阵阵淡淡的清香。抬头看,树冠上金灿灿的小花团团簇簇,随风摇曳,点缀在翠绿的槐叶间,绽放出一树灿烂。

国槐,也称中华槐、家槐,是我国古老的乡土树种,分布广泛,种植历史悠久。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不如老槐歌一歇”,道出了古槐长寿、枯木逢春的顽强生命力。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植槐、爱槐、咏槐。魏晋繁钦的《槐树诗》云:“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足以看出诗人对槐树的喜爱。国槐广植,皇家宫廷、宅旁沟畔、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槐树的身影。

有关槐树的传说和故事历史悠久。周代以来,槐被认为代表“禄”,《尚书·周书·周官》中,三公朝见时面

向三槐而立,槐树由此被称为“三公树”。“槐花黄,举子忙”,自唐代,常以槐代科考,考试年头称槐秋,学子赴考称踏槐,考试月份称槐黄。槐与怀谐音,槐树又是念乡之树,明朝“洪洞移民”期间有首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乡思乡愁溢于言表。传统文化中,槐树寓意着吉祥、富贵和美好,成为一种昂扬精神的象征,充满着神奇的色彩。

一年四季中,国槐最美是花开时。国槐花开七八月间,敢与争艳的百花媲美。将开未开的花蕾叫槐米,一旦花开就叫槐花了。夏日,人们把采摘的槐米晾晒烘干,除去枝梗及杂质即为成品,可制作槐米茶,能食用,还是一种清热解暑的中药材。明代林大春“的童采槐花,落英满空庭”,宋代袁万顷的“槐花满地无人扫,半在墙根印紫苔”,描述的是儿童采摘和槐花

满地的情景,也唤起了几时的记忆。

小时候,我们村有一棵几百年的古槐,老槐树粗大挺拔,树冠如盖,如同一位沧桑老人,默默地为村民们挡风遮雨。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爬上爬下,打闹嬉戏,有时又在树下惬意纳凉,听大人们讲过去的故事。每年最兴奋、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采槐米了。我们爬到树上,或找一根长竹竿,一头绑上铁钩,把树枝拉低,一把一把将槐米撸下来,然后晾晒烘干卖到镇上,就可以换回连环画美美地品读了。有了老槐树的陪伴,我们的童年多了些许欢乐甜蜜的回亿。

槐林漾琼花,芬芳醉万家。这美景,这花香,置身其中,再浮躁的心绪也会变得宁静起来。人世间的多少美好和故事,都蕴藏在国槐含苞待放的花蕾里。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年7月19日)